

国学思潮丛书

Guoxue Sichao Congshu

第二辑



中西会通

ZHONGXI HUIT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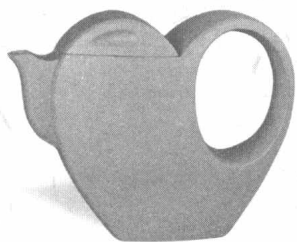
贺昌盛 主编

不守旧，是淘汰旧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拓出新的道路。不盲从，是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在从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认识。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是要清算从前的错误，供给目前的需要，确定将来的方针，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国学思潮丛书

Guoxue Sichao Congshu



第三辑

中西会通

ZHONGXI HUITONG

贺昌盛 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西会通 / 贺昌盛主编. -- 杭州 :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4. 10

(国学思潮丛书 ; 3)

ISBN 978-7-5536-2423-5

I. ①中… II. ①贺… III. ①国学—研究 IV.
①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2696号

国学思潮丛书

第三辑 中西会通

贺昌盛 主编

责任编辑 冯傲雪

责任校对 陈云霞

封面设计 曾国兴

责任印务 陆江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310013)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8.25

插页 1

字数 289 000

版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6-2423-5

定价 40.00元

联系电话 0571-85170300-80928

电子邮箱 zjyy@zjeb.com

网址 www.zjeph.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总 序

任何一个专属概念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国学”之称也是如此。从内涵上说，“国学”乃学术之一种，这一点当属共识，已无可置疑。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国学”一语总是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呢？个中原因也许恰恰是出在为这一概念做出外延规定的“国”字上。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所谓“国”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国”在先秦时期指的其实是“邦”或者“城邑”，秦汉以降则是指“王朝”。但无论是“城邦”还是中央集权性质的“王朝”，其基本形态都与现代性发生以后所出现的“国家”形态完全不同，因为现代意义的“国”至少兼有“地域所属(Country)”、“民族种性(Nation)”和“政权体制(State)”三个层面的所指，与“Country”意义上的“城邦”或“State”意义上的“王朝”均有着根本的差异。“国”这一概念在西语语境中各有其所指，但在汉语语境中，所谓“国”其实是一个复合性的范畴，正因其把“地域所属”、“民族种性”和“政权体制”这三重所指完全统合在了一起，所以才造成了与之相关的诸多概念的歧义与含混，“国学”之争即源出于此。

作为学术之一种，“国学”在“国”的三个不同层面上是有其各自不同的边界和意义的。从“Country”层面上讲，凡属该“国”之“地域所至”范围内所产生的全部文化产品(无论是物质性的还是非物质性的)均可被纳入“国学”研究的范畴，此种研究可视为“区域研究”或“地缘研究”之一种；而从“Nation”的层面上看，“国学”则必须以特定民族的全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其核心重在突出此一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特性，并以此融入多元文化形态之间必要的对话；再从“State”的意义上来说，“国学”在接受特定政权体制保护的同时，实际上也承担起了为此一政权体制提供维护其体制合法性及利益延续性所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的功能。换言之，任何一个学者都可以立足于其所认可的层面视自身的界定为真正的“国学”，同时指责除自身所立足的层面以外的所有

研究为“非国学”。

公正地讲,“国学”并不是单纯的“文化复古”(为往圣继绝学),或者是在后殖民思想刺激下狭隘的民族主义理念的复活(去西方化)。事实上,“国学”恰恰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必然产物,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学”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现代中国学术的代名词。“国学”以其对“民族—国家(Nation)”的认同一直在积极参与着现代民族国家自身的建构,这一点,我们从“国学”最初的诞生及其曲折的发展历程上即可见出。

中国古代的学术一般统称“经学”,宋代以后则被转换成为“理学”,但“理学”并不是对“经学”的否定,而主要是对“经学”给予重新规范,使之逐步趋于专门化和系统化。无论是“经学”还是“理学”,都可以归入传统(古典)解释学的范畴。中国传统学术的真正分化当始于清代。乾嘉时期,出于汉族学者对满族政权的相对规避,一部分学者开始将学术引向对传统经籍的校勘汇证,这就是所谓“汉学”;而另一部分学者仍然继承了由程朱所开创的对于传统“经学”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即所谓“宋学”。“汉宋之争”即源于孰为学术正统的争辩。为了平息这场争辩,清代中叶,以方苞、姚鼐、刘大櫆等人为代表的“桐城派”才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三种学术路向既可独立亦可并举的调和主张,其后继者曾国藩又补充提出了“经济”一途,至此,中国传统学术才出现了“分科而治、合而为学”的基本格局。简要回顾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历史就不难看出,传统学术中其实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国学”的概念,即使有“国学”一说,其所指的也只是某个“邦邑”范围内的“学校”(又称“庠”或“序”),而非学术。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国”之一语从来没有成为“学术”的某种限制性指称,中国古代的学人也从来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国”与“学”之间会发生何种必然的联系。

“国学”的真正出现是始于“西学”的强势冲击。余英时、姜义华等人曾考证,“国学”一词最早其实是来源于日本。幕府末年与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了抵制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儒学与佛学,而开始主张将学术全面转向对日本古典文献和固有文化的研究与发扬,他们自称这个时期的日本古典文化研究为“国学”。日语“国学”一词后来为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人所借用,才转而特指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研究。从总体上看,自章太炎等人倡导“国学”开始,到现今所谓的“国学复兴”,其间大致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

阶段为 1904 年前后,以章太炎在日本开讲《国学概论》及刘师培等人组织“国学保存会”并创办《国粹学报》为标志。这个时期的“国学”与“国粹”基本同义,而且带有非常浓郁的以“学术”来实现“存国保种”之使命的特定色彩,藉此亦可与晚清时代从器物、制度到思想等各个层面均已日趋普遍的“西化”倾向相抗衡。值得注意的是,章、刘等所称的“国学”虽然已经初步具有了“地域”和“族裔”两个层面的蕴涵,但是与“政权体制”划清了严格的界限。换句话说,如果说中国传统学术始终是以“依附”的方式托身于“政权体制”(政—学合一)的庇护的话,那么,自章、刘所倡导的“国学”开始,“学术”与“政体”之间则出现了明显的切割,也即“学术”已经有了努力寻求其自身独立地位的迹象,这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是有着重大的区别的。“国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在“五四”以后,其标志是 1923 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成立及《国学季刊》的创刊。由于胡适等人的努力,“国学”研究开始全面转向对于既有“国故”的重新整理,即所谓“整理国故”运动。“国故”一说仍是源出于章太炎,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理学思想毕竟并非都是“精粹”,称之为“国故”更为妥帖一些。胡适对此的解释是:“‘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很多。……如果有人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胡适认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整理国故”时期的“国学”研究最大的贡献就是,能够在继承章氏等人的学术独立意识的基础上,积极引进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以便重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面貌,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知识论”向度上的努力,因为“整理国故”的另一个潜在的动力实际是来自西方“汉学(Sinology)”的挑战。也就是说,“整理国故”运动一方面使“国学”本身完成了从传统形态的“立命立身之根本”逐步过渡到与“西学”具有平等地位的“知识”之一的角色转换;同时,在另一方面也使“国学”最终有了与西方“汉学”乃至整个“西学”的知识序列相呼应并展开对话的机会,这在相当程度上极大地强化了中国学人自身的学术自信,使中国学人不至于亦步亦趋地紧随“西学”的途径前行。如果说章、刘时代的“国学”倡导和胡适等人的“整理国故”还都是在学术自身内部渐次发生的话,那么,此后的所谓“国学”热潮则开始逐步向生活实践层面滑行了。第三阶段的“国学”热潮出现于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代

表性的事件包括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成立(1929年)、由《教育杂志》发起的有关“尊孔读经”问题的讨论、由民国政府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以及萨孟武、何炳松等人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年)等等。这个阶段的“国学”研究活动中开始出现了“政权体制”积极介入并参与合作的身影,单纯的学术研究也因此开始从“知”(一般知识)的范畴向“行”(行为规范)的范畴渗透。但事实证明,试图以一种古老的道德诉求来规范甚至改变现代人的生存形态,其实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即使有政权体制的强力干涉,所取得的也多半只是表面上的形式效果。第三阶段“国学”热潮的唯一成果,也许仅仅是以中央研究院和各高校的“国学院”为代表的专门学术机构最终获得了政权体制的认可和保护。这类机构虽然已经完全丧失了为政权体制提供任何思想资源的功能,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类专门机构的存在,才为“国学”本身的“知识化”路向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国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即是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所谓“国学复兴”,其标志就是海外“新儒家”的重现、文化守成主义的复活、官方对“国学”研究的大力支持,以及高校“国学院”的普遍复办与兴办等。

有不少学者认为,“国学”复兴热潮是一种典型的反现代性的复古思潮,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填补主流意识形态的缺失所留下的某种空白,它非但无助于现代性在中国的持续展开与最终完成,甚至已经从根本上成为一种阻滞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巨大障碍。此种看法当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至少在章太炎倡导“国学”的时代,“国学”确实是有着明显的反现代性的倾向的。但具体说来,笼统地视“国学”热潮为一种“逆流”性质的复古思想,并认定其会导致现代中国社会的某种停滞和倒退,也许是有些过于夸大“国学”自身所具有的功能了。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当下环境中持续已久的所谓“国学热”,其实跟股票热、理财热、购房热等一样,不过是一种变换了形式的“经济活动”而已——以“国学”名目出现的种种热潮都可以看作是“文化产业”形式的一种,其最终目的也主要是经济利益而非思想建设本身,其于“国学”非但无益,反而可能滋生某种有害的倾向。从学术层面上讲,海外“新儒家”的出现,国内文化守成主义的复活及“国学院”的普遍兴办等等,大都仍旧是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整理工作,整理和研究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使之成为人类所创造的某种特定类型的“知识”的一种。既然这种知识早已经彻底失去了为政治意

识形态提供合法依据的有效功能,那么,借助于纯粹学术层面的研究使之成为人类的“知识遗产”之一应当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再从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上来看,即使有官方以权力形式来大力推进“国学”知识的普及,也已经不大可能会有人真正依据某种古老的道德原则来严格规范自身的行为了,因为随着现代性在中国的日渐推进和发展,作为一种专门类型的“知识”,“国学”所蕴含的诸多核心原则早已经失去了其在实践层面上所必需的文化生存语境。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日常生活中与“国学”相关的诸多名目实际上已经带上了明显的“娱乐化”与“戏仿化”的色彩,这似乎恰恰显示出了某种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对于“国学”之所谓“立命之根、立身之本”之类核心理念的彻底“解构”。在一个已经没有任何崇高和严肃可言的社会环境里,“国学”所赖以立足的基本原则与规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现代人的行为及生存方式产生有效的影响呢?

“国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已经确定了其与中国传统的“经学”所特有的功能之间的深刻差异。如果说章太炎和刘师培时代的“国学”还只是初具学术与政治分离的雏形的话,那么,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则使“国学”初步确立起了独立的学术品质,并使这一特定的称谓真正成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一国之学”的代名词。当知识分子最终摆脱了传统的“政—学”一体的生存格局,而以学院、阅读、写作等方式实现了全新的生存形态的转换时,学术自身之独立地位的确立就成为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学”对于其在“地域所属”与“民族种性”等基本层面上所具有的特定意义的强调,恰恰就是为了能以其对地缘特性与民族特性的凸显,来规避和矫正学术自身片面西化的普遍倾向。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将“国学”从单纯的“复古化”和“娱乐化”等途径上重新导入真正“知识论”的学术视域,以还原其本来的“知识学”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可以成为“国学”的有效载体,因为这里所说的“国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共同体”的标识。非但如此,正如欧美和日本的“汉学/中国学”研究一样,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中国所产生出来的新的哲学、美学、语言学、文学、宗教等文化产品,也都可以被纳入“国学”研究的范畴。现今所谓“国学”毕竟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经学”或“理学”的衍生物,而已经被扩展成为与域外族裔相区别的特定文化形态的专属概念了。张岱年先生就曾说过:“今天研究国学,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经做出的成绩,

还应该推陈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更向前进。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只要“民族—国家”这种历史形态仍然存在,“国学”的概念就无法自行消逝;也只有将“国学”视为一种具有更为广阔的包容性的学术范畴,“国学”才有可能在人类整体的知识序列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编辑例言

一、本丛书根据“国学”思潮在不同阶段的核心趋向分为“国学初萌”、“再造文明”、“中西会通”和“返本开新”四辑,大体依历史演化为线索,以选辑主要人物的代表性论述(论文或论著的节录)为主。

二、本丛书所选辑的文献主要来源于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的由刘修业、侯植忠等前辈学者编写的《〈国学论文索引〉全编》(未选入之篇目也可参照此著另行查阅),文字以杂志初刊或著作初版的原始文献为准,参考现有各式全集、文集、选集及相关研究论著予以校勘核正,学识浅陋,误讹难免,恳请指正,以求完璧。

三、所选早期文献因多为竖排旧版,且句读不一,为方便阅读,均以现有通行横排及标点重新处理,文字中原有繁体、异体已改为简体,原文献中有明显错误的文字也由编者据相关资料作了校正及说明,个别文献由编者自行据上下文意粗略作了段落划分,若有不妥,还望批评。

四、原文献有夹注者,均以括号“()”重新标示,原文之有引文者则改以不同字体作为区分。

五、为使编例统一,节录自著作的文献,原有章节编号已由编者作了重新标号。

六、选文末尾附识简要文字,均为编者一己之感,谬见多多,祈愿求教于大方。

目 录

总序	1
编辑例言	1
全汉升	
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	1
许守微	
论国粹无阻于欧化	42
章士钊	
国学讲习会序	47
刘叔雅	
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钩通	51
唐文治	
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	59
黄忞华	
国粹和欧化	64
申报记者	
省教育会请章太炎讲国学	65
马承堃	
国学摭谭·序	66
胡先骕	
说今日教育之危机	68
梅光迪	
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	75

胡稷咸	
敬告我国学术界	80
杨鸿烈	
国学在世界文化的位置	85
曹聚仁	
审订国学之反响	93
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	96
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	109
许啸天	
国故学讨论集·新序	117
吴文祺	
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	121
王皎我	
中国国学在国际上的新地位及其最近之趋势	129
钱基博	
《国学文选类纂》总叙	134
十年来之国学商兑	145
蔡尚思	
国学之定义及分类	160
杨筠如	
中国语与中国文·序	168
杨卓新	
国学与西学	170
汪 震 王正己	
国学大纲·什么是国学	173
王 易	
国学概论·导言	177

谭正璧	
国学概论讲话·导言	182
国学概论新编·编辑大纲	189
孟宪承	
欧洲之汉学	190
柳诒徵	
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	196
讲国学宜先讲史学	201
何炳松	
论所谓“国学”	209
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	218
黄毅民	
《国学丛论》自序	223
陈钟凡	
十五年来我国之国故整理	225
张树璜	
国学今后之趋势	238
王新命等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244
郭绍虞	
国学论文索引四编·序	248
何 键	
要用最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国学	251
李廷玉	
《国学》发刊序	257
陈其昌	
《国学界》发刊词	259

吴英华

近数十年国学概评 260

许地山

国粹与国学 263

莫东寅

汉学发达史·叙言 276

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

一、引言

当汉魏佛教东来的时候,中国社会流行一种传说,名叫“老子化胡”。这始见于《后汉书·裴楷传》;而鱼豢《魏略·西戎传》说得更清楚,内云:

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二十有九。(《三国志·魏志》裴注引)

此传说的意义在消灭反对佛教者的论据——攘夷说,以利佛教之发展。因我国自战国时起,孟子已提倡用夏变夷,而反对变于夷。此种态度给予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以莫大的阻碍,因为佛教既是属于夷的外国货,当然为中国人所排斥了。可是,事实上外来的佛教却在中国大行其道,这就不能不归功于“老子化胡说”了。“老子化胡说”告诉我们:“佛教虽然是外来的,但我们信仰它并不能算是耻辱。因为佛是我们的老子教化出来的,实是老子的弟子。所以我们信仰佛教,绝对不是表示中国次于夷狄,恰正是表示中国第一。”

自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社会上亦同样的流行一种传说,名叫“西学源出中国”。此说告诉我们:“中西交通自远古以来已经很繁盛,中国古圣贤之学遂能自东而西,教化西人,结果造成了他们今日之所谓西学。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是代数。西人称代数为东来法,这实表示西洋的代数来自中国,因代数在中国已有很久的历史了。此外如墨子书中的《经说上下篇》,实为西洋自然科学的所自出;墨子所倡的兼爱,也就是耶稣的博爱之所本。总之,整个的西学都是出自我们古代的中国。所以我们接受西学,不独没有用夷变夏的嫌疑,而有复古的美誉。”这可以称为近代西学传入时的“老子化胡说”。

可是我们要注意这两种传说本身的真实性。宋《高僧传·卷十七》载释法

明问道流云：

老子化胡成佛，老子为作汉语化？为作胡语化？若汉语化胡，胡即不解。若胡语化，此经到此土便须翻译。未审此经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诵胡语，何人笔受？

道士经此一问，便哑口无言，回答不出来了。同样的，西学源出中国论者所提出的证据，除了火炮一项值得考虑外，其余大都是莫须有的。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是莫须有，便忽略它在近代中西文化接触史上的意义。

或许有人，尤其是看不起中国文化的外人，要讥笑中国人常在撒谎中过活。其实，这何有于中国人呢？自诩为有色人种的统治者们，不也是这样吗？德国某学者说，孔子有日耳曼人的血统，固不值识者一哂；就是安特生(C.G. Anderson)说仰韶文化源出西方，又有何是处？然则我们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每有该文化源出中国的传说，亦不足为奇的了。

二、西学源出中国说之史的考察

西学传入时的“老子化胡说”，在清光绪戊戌政变左右，最为发达。但它绝不是偶然发生，而是继承过去二百多年以来各人的主张而发展成功的。现在且先把这笔账清算一下。

这种传说的始作俑者，要推清初最有科学头脑的大数学家梅穀成。梅穀成字玉汝，号循斋，安徽宣城人。他是头一个发明中国古代的立天元一法即是西洋的代数，从而断定西洋的代数是学自中国的人。他的《赤水遗珍天元一即借根方解》说：

后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方法，且谕曰：“西洋人名此书为阿尔热八达，译言‘东来法’也。”敬受而读之。其法神妙，诚算学之指南，而窃疑天元一之术颇与相似。复取《授时历草》观之，乃涣如冰释，殆名异而实同，非徒曰似之已也。夫元时学士著书，台官治历，莫非此物，不知何故遂失其传。犹幸远人慕化，复得故物。“东来”之名，彼尚不能忘所自。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七·测圆海镜》亦说：

迨我国家，醱化翔洽，梯航鳞萃，欧逻巴人始以借根方法进呈。圣祖仁皇帝授蒙养斋诸臣习之。梅穀成乃悟即古立天元一法，于《赤水遗珍》中详解之，且载西名阿尔热巴拉即华言东来法，知即（李）冶之遗书，流入西域，又转而还入中原也。

这里说的“西域”，绝不是狭义西域，而是广义的，连西洋亦包括在内；因为文中提到的欧逻巴，与西域几乎是同一意义的原故。

康熙帝根据梅氏这种说法，便推论到整个的西洋历法都是源出自中国。他说：

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源，源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精密，非有他术也。（《康熙政要·卷十八》引《御制文三集》）

此外还有许多西学源出中国的推论，都是根据梅氏这种说法出发的，容后再述。在以前专制政体时代，皇帝一开金口，便都认为是金科玉律。康熙既然这样说过，无论它是真理与否，有清一代的学者，也就乐得推波助澜来作应声虫了。在这些应声虫中，可以先拿《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为代表。这里说的西法源出《周髀》，就是康熙西法源出中国的响应：

其（《周髀算经》）本文之广大精微者，皆足以存古法之意，开西法之源。……明万历中，欧逻巴人入中国，始别立新法，号为精密。然其言地圆，即《周髀》所谓地位覆槃，滂沱四隤而下也。其言南北里差，即《周髀》所谓北极左右，夏有不释之冰，物有朝生暮获，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谷一岁再熟，是为寒暑推移，随南北不同之故；及所谓春分至秋分极下常有日光，秋分至春分极下常无日光，是为昼夜永短，随南北不同之故也。其言东西里差，即《周髀》所谓东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日中，东方夜半，昼夜易处，如四时相反，是为节气合朔，如时早晚，随东西不同之故